

聂卫平 王端阳 著

围棋人生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棋人生/聂卫平,王端阳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8

ISBN 7-5059-3432-5

I. 围… II. ①聂… ②王… III. 聂卫平-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969 号

书 名	围棋人生
作 者	聂卫平 王端阳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仲江 曹利群
责任校对	仲江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1
插 页	6 页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14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432-5/I·2616
定 价	18.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卫平和我	沈君山
------------	-----

生 活 篇

我的童年	(1)
我和陈老总	(9)
我的恩师们	(15)
初露锋芒	(25)
我也当过红卫兵	(31)
初 恋	(39)
山河农场	(48)
孔祥明	(57)
王 静	(66)
亲与情	(72)
邓老爷子	(75)
耀邦叔叔	(81)
金庸和沈君山	(88)
吴清源	(91)
陈祖德	(93)
邓朴方	(97)
我和足球	(99)

国际交往·····	(104)
台湾行·····	(109)
为民出气·····	(117)
四次遇险·····	(124)
我和广告·····	(130)

围 棋 篇

国家集训队·····	(132)
首次夺冠·····	(142)
冲击日本九段·····	(146)
“聂旋风”·····	(152)
聂卫平时代·····	(161)
心理战·····	(166)
乐山惨败·····	(173)
新体育杯·····	(177)
自信与狂妄·····	(187)
对抗时代·····	(192)
第一届擂台赛·····	(201)
小林光一·····	(209)
藤泽秀行·····	(224)
第二届擂台赛·····	(230)
武宫正树·····	(242)
大竹英雄·····	(247)
第三届擂台赛·····	(254)
第四届擂台赛·····	(258)
总结擂台赛·····	(264)

应氏杯·····	(267)
富士通杯·····	(272)
收徒风波·····	(277)

附 录

年 表·····	(282)
----------	-------

人生九局

最难忘的一局	1974.12 对宫本直毅九段(285)
震撼日本棋坛的一局	1976.4 对石田芳夫九段(289)
最惊心动魄的一局	1985.8 对小林光一九段(294)
可以传之后世的一局	1985.8 对加藤正夫九段(298)
最激动人心的一局	1985.11 对藤泽秀行九段(303)
被称为“世纪之战”的一局	1987.3 对武宫正树九段(307)
呕心沥血的一局	1987.4 对大竹英雄九段(310)
印象最深的一局	1988.10 对依田纪基七段(315)
最遗憾的一局	1989.9 对曹薰铉九段 (318)

性情中人聂卫平——编后记·····	(322)
-------------------	-------

我的童年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地争强好胜。

我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的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免修体育课。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经常向班上的“大王”进贡点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欺负过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还是得乖乖地给他们送去，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总之，这些事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证明自己

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并对所有能比出输赢的游戏产生兴趣,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地争强好胜。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使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出不少难题,这常常引来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那些欺负我的人恰恰是数学成绩最差的,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暗暗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使我感到自己的优势。

在少年时代,我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场“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然,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后悔;相反,当初对数学的爱好,对我以后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学围棋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像现在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刻意去学。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摆开棋盘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

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仍不肯离去。

那时我特别盼望过夏天，因为吃过晚饭后，全家人照例都要到院子里乘凉，这时一张棋桌是绝不可少的。当大人在棋盘上杀得难解难分时，在一旁观战的孩子们就会分成两派，通常是姐姐们为妈妈助威，而我们男孩则为爸爸或是外公加油，有时还走上一两步让大人哭笑不得的“高着”，那热闹情景真使我感到其乐无穷。

严格地讲，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时，我和弟弟继波便常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游戏全都索然无味了。

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下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之下，无形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

刚开始时，我们旗鼓相当，拼杀得十分激烈，输赢也基本上差不多，逐渐地情况就有些不对头了，再和弟弟下，不但很难吃到他的棋，而且自己的棋却屡遭“毒手”。到后来，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无法取胜。一向以智商高而自负的我，对于惨败在弟弟手下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打败继波”成了我10岁时的惟一奋斗目标。

在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哥哥的杀个落花流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了。本来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热衷此道,知道围棋是一项陶冶性情、有益思维的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以下棋为终身事业,简直想都不曾想过。

大概是1965年,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断然拒绝。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当初对我和弟弟无师自通学会下围棋,父母感到既惊讶又有趣,偶尔还屈尊和我们杀上一盘。后来发现我们总下个没完,连觉都不想睡,饭也不好好吃,便开始加以约束。不过由于我们在学习上还算争气,这种约束还只是象征性的,等到我因下棋而昏倒,情况就不同了。妈妈立即给我们定下许多规矩,其中“不许天天下棋,晚上9点必须关灯”两条着实把我憋得够呛。有时心痒难熬便关了灯假装睡觉,等妈妈一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就悄悄起来,打开台灯杀上几盘过过瘾。当然,如果被妈妈发觉,一顿训斥总是免不了的。

在我10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便带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由张福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说明来意,希望找两位少年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也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那时

除了爸爸、妈妈和外公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还从来没有和外人下过棋。而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和我们不一样，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所谓的“科班出身”。

张先生欣然同意，随便点了两名少年棋手和我们下起来。我和继波虽说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阵，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开始他们对我们这种“野路子”很看不起，但走上几着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大概他们受的都是循规蹈矩的正规训练，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这样不守“规矩”的下法，结果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番上阵，我们也杀得兴起，经过一场场混战之后，“正规军”居然被我们这支“游击队”杀得全军覆没。

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当即表示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张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参加过比赛。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其实我当时的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我 17 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像故意气我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惟独和我下了不少局。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

这样做的。他曾向人谈起过我的一件事：在自由活动时，训练班的孩子们全都跑到外面去玩，只有我喜欢留在训练室里摆棋。一次张先生偶然发现我偷偷打开了他的提包，当然不由吃了一惊，但发现我只是拿出一本棋书，全神贯注地看起来，过后又悄悄放了回去。这件事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后来见我经常如此，不禁大为赞赏。他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便知用功，不肯贪玩，将来必定能成材，所以对我格外垂青。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可以说，张福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我对他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也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了我。不过他很怪，他自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汝莽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莽家挨着，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那天不知为什么事他心里生气，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莽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文革”抄家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革”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我在后

面再谈。

为了下棋，我真是没少让父母操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比赛，刘仁伯伯送给我一张请柬，可一看日期傻了眼，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我犹豫不定。观看日本棋手的比赛对我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上学了，然后偷偷直奔赛场民族文化宫。

逃学，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可为了看围棋，我还是犯了“天条”。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复盘，仍然没有被发现，第三天我又抱着侥幸心理去看第二盘比赛。老师见我连着三天没来上课，就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正巧是我妈妈接的电话，这下露了馅儿。我妈妈立刻就想到那张请柬，二话没说就追到民族文化宫。

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尾原和陈祖德的那盘棋，罗建文过来告诉我“你妈来了”。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不妙了，因为家里对我们管教很严，特别是我妈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要挨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可那个大厅里躲都没处躲，慌乱之中就躲到男厕所里。其实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当时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妈妈找遍赛场也没找到我，于是就气冲冲地叫国家围棋队领队李正洛把我交出来。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注意，就说没有。我妈妈不信，还和人家大吵了一顿。等我妈妈走了，人家来告诉我，

我这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家后就被我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逃过学。

当时父母不仅让我给老师写了检查,而且声色俱厉地宣布,以后禁止我再摸棋子。我听了之后真比打我都难受。好在这条“禁令”并没有真正执行,就像所有当父母的一样,气头上说的话过后也就忘了。

我和陈老总

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10岁那年和陈毅元帅下过一盘棋，从那以后我们竟成了棋友。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2年夏天，我和弟弟继波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大人下棋。正看得带劲儿，我姐姐突然跑来找我，让我赶紧回家。什么原因她也不说，我就感到挺奇怪的。

回到家就让我洗澡。那时洗澡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不愿意洗澡。可没办法，大人逼着洗也只能洗了。洗完澡还换了身新衣服，我就更奇怪了。这时我姐姐才告诉我陈老总要我下棋。那时我才10岁，还搞不清楚谁是陈老总。我姐姐说陈老总就是陈毅元帅，我还天真地问怎么元帅也会下棋？在我的脑子里，元帅都是带兵打仗的。

第二天上午，父亲领着我和继波来到北京体育馆东楼招待所。由爸爸亲自带我们去下棋，这可是破天荒的事。

出门前，父亲一再叮嘱我们见了陈老总一定要先问陈伯伯好，要有礼貌，不许乱说乱动，不许随便吃人家的东西等等。

可一进大厅，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了，什么都觉得新鲜，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被沙发围绕着的茶几上的棋盘和棋子，恨不得立即坐在沙发上，痛痛快快杀一盘，连向陈老总问好都忘了。直到父亲忍不住连声催促我时，才发觉陈老总已经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了。

陈老总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几岁啦、学棋时间啦、棋力如何啦等等。记得有一个问题使我很难堪，就是“你下得过弟弟吗”？虽然我确实下不过弟弟，但“下不过”这三个字就像根骨头鲠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后来还是父亲替我做了回答。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立三、过惕生和过旭初。李立三我原来就认识，那时他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每个周末他都派车接我和继波到他家下棋。他家养了好几条狗，我小时候还很害怕。下完棋还请我们吃饭，开开荤。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极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错的事了。李立三给我的印象是极为豪放，他的围棋水平并不高，每次输给我后都哈哈大笑，整个客厅全是他的笑声，我觉得灯都要被震下来了。李立三同陈老总关系密切，就是他跟陈老总讲，有个不到10岁的孩子，棋下得很好，这样陈老总才知道了我，并把我接去下棋。

简单交谈过后，陈老总便邀请我们入座。大概是继波水平比我高的缘故，陈老总首先选择了他，我则和李立三对局。第一轮继波输给了陈老总，我胜了李立三，然后我们交换了个位置，我对陈老总，继波对李立三。

我从小下棋就很认真，从来不愿让人，不管是谁。对陈

老总我也是毫不留情，直到杀得陈老总投子认负。这个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因为继波输给了陈老总，而我却战胜了陈老总，对我来说，这可是双重的胜利。

下完棋，陈老总留我们吃午饭，在吃饭时我可是闹了大笑话。那时我们家生活简朴，像汽水也算是高档消费品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不可能随便就喝的。吃饭时服务员给我倒上汽水，我一尝，特别好喝，几口就喝光了。我刚喝完，服务员又给我倒上，再喝光，又倒上，就这样我连喝了十几瓶，到后来居然喝“醉”了，头晕得不得了，只觉得天昏地转，吃着半截饭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发上。陈老总叫我吃担担面，我起都起不来了。后来怎么回的家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父亲一顿打，说我太没出息了，一点样子也没有。

没想到晚上陈老总又把我们接去，这次是在首长休息室。那天中国围棋代表团刚出国比赛回来，陈老总正在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也在场。他们就如何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谈了很多，可惜我那时还很小，谈话的内容还听不大懂，只知道和围棋有关。

这时服务员端上西瓜，陈老总指着西瓜对我说，小聂，吃西瓜。我很想吃，可又不敢，因为出来时我受到父亲的严厉管教，不允许我随便吃东西。陈老总估计我回去后挨了训，幽默地说，这个东西吃不醉哟。我看了父亲一眼，得到他的允许后我才吃了。以后我特别爱吃西瓜，在大的比赛中，我不吃午饭也要吃西瓜是有了名的，这不能不说同这次陈老总请我吃西瓜有关。

自从和陈老总认识后，只要有时间，他便把我接去杀上几盘。有一年暑假，陈老总说，你们白天好好睡一觉，晚上

陪我下棋，我请你们吃夜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他下棋，直到快开学时，他大请我们一次，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要“告别”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一上课，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陪他下棋了。

在陈老总面前，一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后来见他总是笑咪咪的，也没架子，就有点“放肆”起来。有一次对局，陈老总刚刚下了一步，可能发觉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去，不曾想被我一把握住了手腕，硬是不让他悔棋。当时我气急败坏的样子逗得陈老总哈哈大笑，周围的人也都哭笑不得。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谈。

和陈老总交往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话的意思我是记得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后，陈老总曾说过，原子弹相当于围棋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这使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懂得了下围棋并不是单纯的玩，而是和民族荣誉、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

经常和陈老总一起同我们下棋的还有张劲夫、金明、胡立教、孙乐宜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和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下过棋。我那时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上将、兵团司令，是陈毅元帅的手下败将。一次在政协礼堂我同时遇见他们两人，我就在心里把他们进行比较。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国民党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我看着他们两人都很和蔼，从外表上看不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国民党。我特别喜欢宋希濂还有一个原因，他总爱请我吃冰淇淋，政协礼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别好吃，吃得我对他极有好感。“文革”